

廣東番禺沙亭屈氏南遷考

王富鵬*

摘要：廣東沙亭屈氏人才輩出。沙亭屈氏南遷與中國的歷史大事變相關聯，對其遷徙過程和細節的瞭解有助於中國家族文化和中國移民史的研究。相關文獻關於其祖上南遷的敘述，字面上存在一些齟齬之處。認真梳理之後可知沙亭屈氏南遷的大體情況：唐代屈政自關中宦遊嶺南，子孫家於南雄。北宋徽宗時其裔孫屈禹勤北上出仕。宋室南渡之際，屈禹勤及其子屈偉自京師南下，先止南雄，再遷至珠江南岸之沙亭。沙亭屈氏遂以屈禹勤為始遷之祖。

關鍵詞：番禺沙亭 屈大均 屈禹勤 始遷祖 家族

廣東番禺沙亭屈氏在有明一代，不但是當地豪族，而且人才輩出，明末清初光耀中國文學史冊的詩人學者屈大均就出自沙亭屈氏家族。中國文學史上的兩位屈姓大家，屈原和屈大均一前一後，可謂雙峰並峙。屈大均自稱是屈原後裔，然而本源於先秦荆楚的屈氏，又是何時自何地遷往嶺南的呢？

一. 相互矛盾的記述

沙亭屈氏南遷的情況，屈大均等人在文章中有零星的記述。屈大均「吾始祖迪功郎誠齋當宋徽宗時，來居於此」¹的敘述是最為人們普遍接受的看法。不過，將屈大均在不同文章中的有關敘述對比之後發現，其敘述實際上存在著一定的矛盾。

這些矛盾不難發現，並且有學者因此懷疑其敘述的可靠性。林鏗宇先生說：「關於沙亭屈氏先世譜系的說法紛繁雜亂，不僅屈士煌、屈大均同族兄弟間互有參差，屈大均自己所述也時常自相矛盾，這不僅讓人懷疑屈氏先世譜系屬人為構建，同時也可能說明在明清之際，屈氏還未編訂一本統一可靠的族譜……學界一般認為，珠璣巷移民並非史實，而是產生於明代的傳說，各族譜記載詳細，卻不見於地方志。實際可能是當地少數土著為融入漢族社會、取得文化正統身份、追求共同的族群認同而編造的故事……綜上

* 王富鵬，廣州大典研究中心教授。

1. 屈大均：《屈大均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第3冊，頁472。

所述，沙亭屈氏實亦為廣東土著宗族。」² 與林鏗宇先生不同，有些學者則比較謹慎，對此表示存疑。覃召文先生認為大均「述說的那一部宗族史究竟有多少確切的成分還很難說，他自稱是南楚人也未必合乎歷史實際」。³ 謝崇熙先生說：「關於南屈宗族的歷史，類似記述在屈大均的文集中多有提及。姑且不論真實與否，強調作為屈原後裔，則有意無意成為屈大均的個人標榜。」⁴ 現代人雖然懷疑沙亭屈氏與屈原的關聯，甚至有人懷疑其為當地土著，但古人卻有不同的說法。明代黃佐在《廣東通志》中記載：「屈氏，半姓，楚公族之後，南海多此族。洪武中，有屈美人。今其家有領鄉薦者。」⁵ 孰是孰非姑且不論，筆者結合現在能夠見到的文獻，再細細梳理相關的記載，發現屈大均表面看似矛盾的敘述，在事理上其實是合乎邏輯的。

屈大均〈沙亭解〉云：「沙亭在番禺茭塘都，吾始祖迪功郎誠齋當宋徽宗時，來居於此。其地濱扶胥江，多細沙。又念先大夫懷沙而死，因名鄉曰沙亭。」⁶ 大均仲兄屈士煌說「先世翰林誠齋公卜居沙亭」。⁷ 屈大均〈存耕堂稿序〉曰：「祖翰林誠齋公，當宋南渡時，公從祥符珠璣巷來，止南雄，其巷亦名珠璣，已而復遷沙亭。」⁸ 儘管遷往番禺沙亭的具體時間，幾處文獻有一定的出入，如「宋徽宗時」「宋南渡時」「蓋宋紹興間」和「南宋」等，但綜合之後，我們還是可以大體得出一個比較合理說法：被視為南屈之祖的屈禹勤是在兩宋之交遷至番禺沙亭的。雖然屈禹勤在「南雄」「祥符」「珠璣巷」之間如何往復，最後遷至「沙亭」時的具體細節我們不得而知，但通過對這些材料的梳理大體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屈禹勤在宋室南渡時，隨王室而南遷，再遷至番禺沙亭，因「念先大夫懷沙而死」，而名遷入地為「沙亭」。由這些材料可以說明遷入沙亭的時間是宋室南渡之時，遷出地為祥符（今河南開封）珠璣巷。

不過，屈大均自己的敘述還有與此相齟齬的地方。屈大均〈先考澹足公處士四松阡表〉云：澹足公「蓋宋紹興間，自關中來，為南屈之祖，迪功郎翰林誠齋公諱禹勤之第十七世孫也」。⁹ 屈大均〈閩史自序〉云：「吾番禺屈氏，當宋南渡時，有祖迪功郎諱禹勤者，實從關中來，始居沙亭，今至予十有八世。」¹⁰ 這裏說遷出地為關中。另一則材料與此出入更大。屈大均〈西屈族祖姑韓安人遺詩序〉云：「考吾屈自漢高帝遷之關中……傳至有唐，吾屈有節度使諱政者，自關中來，始居梅嶺之南。南宋時其孫迪功郎

2. 林鏗宇：〈番禺沙亭屈氏家族南海廟施田考〉，《中國地方誌》第12期（2016年12月），頁56。

3. 覃召文：〈尋根的心跡——論屈大均〉，《文學遺產》第6期（1995年11月），頁90。

4. 謝崇熙：〈清初明遺民的「屈陶」論述〉（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08年1月），頁41。

5. 黃佐纂修：〔嘉靖〕《廣東通志》卷20〈民物志·姓氏〉，嘉靖四十年（1561）刻本，《廣州大典》（廣州：廣州出版社，2005年），第240冊，頁544。

6. 屈大均：《屈大均全集》，第3冊，頁472。

7. 屈士煌：〈南海廟施田記〉，載崔弼輯撰：《波羅外紀》，清嘉慶年間（1796-1820）刻本，卷7，頁19上。

8. 屈大均：《屈大均全集》，第3冊，頁67。

9. 屈大均：《屈大均全集》，第3冊，頁137。

10. 屈大均：《屈大均全集》，第3冊，頁46。

誠齋又遷於番禺沙亭……復號為南屈。」¹¹ 這裏，不但遷出地變為關中，而且南遷的時間也變成了唐代，始遷者也成了屈政。

認真梳理多種資料之後，有關沙亭屈氏南遷的情況大致可以得出兩種說法：（一）始遷時間為唐，始遷祖為屈政，所由之地為關中，遷入地為南雄；（二）始遷時間為兩宋之交，始遷祖為屈禹勤，所由之地為祥符（今河南開封）珠璣巷，或關中。這兩種說法到底哪一個才是真實的呢？既然這些說法都出自屈大均等人，應該說這兩種說法都有一定的依據，以屈大均之嚴謹向壁虛構似乎不太可能。如果說都有一定的事實依據，那麼二者之間到底有著怎樣的關聯呢？

以上這些引述都是一些零散的資料，有沒有相對系統的文獻提供更完整詳細的資訊呢？

二. 始遷嶺南

番禺沙亭《屈氏族譜》和屈大均著《閩史》皆已失傳。江源《中華姓氏始遷祖世系大典》一千卷，第三百四十四和三百四十五卷所收有屈氏遷徙的文獻。¹² 翻閱之後發現，沒有片言隻語提及嶺南屈氏。

不過，通過梳理地方志和相關族譜中的資料再結合屈大均等人的相關記述，還是可以考索出番禺沙亭屈氏的世系及南遷的大體情況的。梳理之後發現，遷入番禺沙亭的過程相當曲折。

雖然番禺沙亭《屈氏族譜》和屈大均《閩史》皆已失傳，但筆者卻有幸見到了與沙亭屈氏有關聯的《宦溪屈氏族譜》和《新會縣屈氏族譜》稿抄本。據《新會縣屈氏族譜》記載，新會屈氏是明初沙亭屈氏第九世屈伯英的後裔，故族譜亦載九世之前沙亭屈氏族人，也略及其後沙亭屈氏部分族人之事蹟。¹³《宦溪屈氏族譜》所載今廣州天河區宦溪屈氏始遷祖屈禹祿，為沙亭屈氏始遷祖屈禹勤之弟。¹⁴ 故此二譜對考索沙亭屈氏很有幫助。

〈屈氏由秘較公入粵宗圖〉云：「曉，字秘較，配雷氏，子二。先世自楚三閩遷關中，宋南渡分支入粵，居南雄，後卜居番禺鹿步司飯籬岡鄉住……妣……系南雄珠璣巷雷君建公女。與公合葬鹿步司石碑村附近雞籠岡。禹勤，字誠齋，配吳氏，子一。公受學范祖禹先生，登宋徽宗崇寧鄉薦，登大觀進士，至嶺南節度使。番禺芡塘司莘汀始遷之祖。今氏族繁衍，未及悉載。禹祿，字誠爵，配梁氏，公乃宦溪鄉始遷之祖，詳後。」¹⁵ 明清時期的番禺縣鹿步司約在今廣州市黃埔區及天河區東部。莘汀即是今廣州市番禺區莘汀（或作新汀）村，是今番禺沙亭屈氏族人三個主要聚居地之一，另外兩個

11. 屈大均：《屈大均全集》，第3冊，頁82-83。

12. 見江源：《中華姓氏始遷祖世系大典》（北京：線裝書局，2008年）。

13. 見《新會縣屈氏族譜》（2005年修，稿本），頁2。

14. 見《宦溪屈氏族譜》（抄本），頁7。

15. 見《宦溪屈氏族譜》，抄本，頁7。

是思賢村和沙亭村。其中有關沙亭屈氏的記載與屈大均等人的有關記述基本一致。〈宦溪房始遷五代之宗圖〉記載：「禹祿，字誠爵，配梁，子二……妣……系南雄珠璣巷梁宏道公之女。與公合葬增城下靈圃。」¹⁶ 由這兩段文字可知，所謂的屈氏始遷祖禹勤、禹祿及其父屈曉在遷至廣州之前可能早已生活在嶺南。屈曉之配雷氏「系南雄珠璣巷雷君建公女。與公合葬鹿步司石碑村附近雞籠岡。」禹祿之配梁氏「系南雄珠璣巷梁宏道公之女。」雷氏和梁氏婆媳二人皆南雄珠璣巷人，年輕之時來歸屈氏父子，可知屈曉和禹祿年輕之時很可能就生活在梅嶺之南的南雄，甚至有可能父子即出生於嶺南。《新會縣屈氏族譜》的有關記載就印證了這一推測。其〈屈氏世次紀〉云：「禹勤字元勵號誠齋，原系南雄府珠璣巷人。其先世系出於楚。自唐來，官（疑為『宦』）遊嶺南，遂居焉。相傳為三閭大夫之裔第，世代綿遠，罔得而究也。」¹⁷「禹勤……原系南雄府珠璣巷人」，這一敘述更明確道出屈氏早在唐時已落戶嶺南了。

「其先世系出於楚。自唐來，官（疑為『宦』）遊嶺南，遂居焉。」這也與屈大均的記述基本一致：「考吾屈自漢高帝遷之關中……傳至有唐，吾屈有節度使諱政者，自關中來，始居梅嶺之南。」¹⁸ 由屈大均的記述知唐時這位宦遊且家於嶺南的即是屈政。明萬曆年間李鳳〈重修屈氏宗譜序〉云：「考屈之先，楚武王子瑕，食采於屈邑。後相仍為氏。氏始於屈，到不以一身事於楚，國繼於屈，建令尹於楚有聲。至三閭大夫而族始且右矣。有伯達以仕，自楚遷關中，有政以仕，自關中遷嶺表。」¹⁹ 這裏也提到了屈政這一關鍵人物。

由此可知，屈政當是始遷嶺南，且家於「梅嶺之南」的屈氏始祖。

三. 再遷沙亭

屈大均等人在文章中多次提到其祖屈禹勤，當兩宋之交，隨宋室南渡，卜居沙亭。雖然時間、地點、人物和背景都非常明確，似乎沒有繼續考究的必要，其實不然。屈大均、屈士煌等人的敘述是對這個過程的高度概括，其中的曲折被略去了。

在南遷過程中，除屈政、屈禹勤之外，還有一個重要人物，就是屈偉。多個族譜都曾提到凌江（或作「陵江」）公屈偉。從族譜所提供的資訊看，沙亭屈氏二世祖屈偉在這一過程中的作用也很重要。

明「正統四年己未冬十月初吉嘉議大夫禮部左侍郎陳璉」撰〈屈氏宗譜序〉云：「番禺沙亭之屈，其先世楚人，相傳為三閭大夫之裔第。世代綿邈，無得而究也。在宋中葉，有為迪功郎者，自陵江宦遊入廣，遂居沙亭，逮今十有一世。宗支繁衍，稱為茂族。而譜牒則始於迪功郎，世次相傳，的然可考。未嘗妄有扳援，以誣其先親。彼冒邨

16. 見《宦溪屈氏族譜》，抄本，頁8。

17. 見《新會縣屈氏族譜》，2005年修，稿本，頁26。

18. 屈大均：〈西屈族祖姑韓安人遺詩序〉，《屈大均全集》，第3冊，頁82。

19. 見《新會縣屈氏族譜》，2005年修，稿本，頁5。

國之胄，拜汾陽之墓者，豈同日語哉！今日鑿者，迪功郎十一世孫也。」²⁰ 明代嶺南著名詩人陳璉之序當為屈鑿所修族譜而撰。這篇序中提到「自陵江宦遊入廣」。「陵江」即是沙亭屈氏二世祖屈偉。《新會縣屈氏族譜》云：「二世祖，諱偉字邦傑號陵江，與父同入廣。登宋高宗紹興二年壬子（公元1132年）鄉薦，癸丑（公元1133年）連捷進士。初授校書郎，後官至翰林院承旨……生一子諱觀禮。」²¹「陵江」當為《番禺沙亭村孟舒祖家譜》和《宦溪屈氏族譜》所謂的「凌江」。「二世祖，諱偉（原無『偉』字，筆者補），字邦傑，號凌江，勤子。隨宦遊入廣。生於宋崇寧丙戌九月十五，登高宗紹興二年壬子鄉薦，三年癸丑進士，任校書郎。」²² 在《番禺沙亭村孟舒祖家譜》中沒有見到號「陵江」者，因這一抄本蟲蝕嚴重，不足為據。清康熙三十八年己卯（1699）孟夏宦溪第二十世屈廷顯撰〈宦溪屈氏重修族譜序〉云：「番禺宦溪鄉屈族，其先世楚人，在宋中凌江公自宦遊至廣，遂居此而聚族焉，逮今二十一世。宗支蕃衍，瓜瓞延長……相傳為三閭大夫之遺裔云。然念始祖禹祿公以至八世，居室置業，子孫遂喜曰苟合矣。」²³《宦溪屈氏族譜》保存完好，記載其始祖禹祿，字誠爵，生子鱗、雄，字分別為士龍、士鳳，其後也沒有稱作「陵江」者。因此，「陵江」「凌江」當為一人。雖然屈氏族人視禹勤和禹祿為始遷之祖，但多個族譜卻謂凌江公「隨宦遊入廣」「宋中凌江公自宦遊至廣」「自陵江宦遊入廣」，可見在兩宋之際屈氏南遷的過程中凌江公屈偉的重要。所謂「宦遊入廣」，揆其語意，此前其生活的地方當不在嶺南，而主要在北方。

如前所引屈政自關中來粵，始居梅嶺之南。屈曉配南雄珠璣巷雷公之女，生子禹勤、禹祿。禹勤、禹祿雖為「南雄府珠璣巷人」，其祖籍則可謂關中。禹勤曾入仕北宋徽宗一朝，為翰林，故為官期間，亦當居於京城，其子屈偉亦當長期生活於北方。基於這種情況，不同文獻字面上出現的衝突也就可以理解了。簡單梳理一下，大致可以得出這樣一個遷徙輪廓：唐代屈政由關中宦遊嶺南，遂於梅嶺之南繁衍生息，其子孫也與嶺南人相互婚嫁。趙宋立國之後，其後人當在嶺南、關中和京城開封之間，多有往返。北宋徽宗年間屈禹勤北上京城為官，其子屈偉亦當成長於北方。宋室南渡之時，屈偉奉其父母舉家南遷，回到南雄，止於珠璣巷。與家族其他成員相商之後，再奉父輩南遷至廣州。屈禹勤卜居珠江南岸——番禺茭塘司，屈禹祿卜居珠江之北——番禺鹿步司。番禺茭塘司屈氏隨奉屈禹勤為遷始祖，番禺鹿步司屈氏奉屈禹祿為始遷之祖。因此，始遷時間為唐、為宋，始遷之祖為屈政、為禹勤，所由之地為關中、為祥符珠璣巷等，這些看似矛盾的敘述在邏輯上也就不合理了。字面相互衝突的敘述恰恰說明屈氏南遷過程的曲折和複雜。

20. 見《新會縣屈氏族譜》，2005年修，稿本，頁4。

21. 見《新會縣屈氏族譜》，2005年修，稿本，頁26。

22. 見《番禺沙亭村孟舒祖家譜》，抄本，頁5。

23. 見《宦溪屈氏族譜》，抄本，頁3。

四. 從屈政到屈禹勤

在屈氏遷往嶺南的整個過程中，時間跨越唐宋兩代的幾個重要人物，屈政、屈曉、屈禹勤等其世次如何呢？是父子、祖孫，抑或是相隔數代之祖孫？

屈大均〈西屈族祖姑韓安人遺詩序〉云：「考吾屈自漢高帝遷之關中……傳至有唐，吾屈有節度使諱政者，自關中來，始居梅嶺之南。南宋時，其孫迪功郎誠齋又遷於番禺沙亭……復號為南屈。」²⁴ 屈大均這裏說屈政與屈禹勤為祖孫，以此而推，屈政與屈曉當為父子。但屈大均〈閩史自序〉又云：「吾番禺屈氏，當宋南渡時，有祖迪功郎諱禹勤者，實從關中來，始居沙亭，今至予十有八世，不知迪功郎之祖何人。」²⁵ 這裏又說不知其祖何人。顯然屈大均並不清楚屈政與屈禹勤相隔幾代。如果根據這些材料所記載的時代，再以情理進行推測，可以確定屈政與屈曉絕非父子，甚至是相隔數代之祖孫。

〈屈氏由秘較公入粵宗圖〉云：「禹勤，字誠齋，配吳氏，子一。公受學范祖禹先生，登宋徽宗崇寧鄉薦，登大觀進士，至嶺南節度使。番禺茭塘司莘汀始遷之祖。今氏族繁衍，未及悉載。」²⁶ 《新會縣屈氏族譜·仕官（疑為『宦』）功名錄》「禹勤：受學范祖禹先生，登宋徽宗崇寧（原作『崇寧』，筆者改）四年乙酉（公元1105年）鄉薦，登大觀三年己丑（公元1109年）進士，官至嶺南節度使。」²⁷ 屈大均〈沙亭解〉：「沙亭在番禺茭塘都，吾始祖迪功郎誠齋當宋徽宗時，來居於此。其地濱扶胥江，多細沙。又念先大夫懷沙而死，因名鄉曰沙亭。」²⁸ 北宋亡於公元1127年。多個族譜皆云屈禹勤登徽宗崇寧鄉薦、大觀進士，多處文獻又記載隨宋室南渡，酌其情理，這幾處文獻對這些主要事情的記載應該相對可靠。由此基本可以確定屈禹勤主要生活在北宋後半葉，這樣才能趕上宋室南渡這一重大事變。再結合幾個族譜對其子屈偉的敘述，屈禹勤在宋室南渡時，已近暮年，屈偉也已經成年。

但是如果以宦溪族譜有關屈曉和屈禹祿生卒年的具體記載為準，禹勤和禹祿兄弟就應該生活在北宋前半葉，而不是後半葉。北宋自太祖趙匡胤建隆元年（960）起，到欽宗趙桓靖康二年（1127）止，共一百六十多年。他們如果生活在北宋前半葉，無論如何都無法趕上宋室南渡這一重大事變。

多個族譜稿抄本皆云屈禹勤曾受學於北宋范祖禹。范祖禹，字淳甫，曾參與編撰《資治通鑒》，是北宋時期著名學者，在宋哲宗年間（1086-1100）曾被貶昭州別駕，英州安置。如果屈禹勤確曾受學於范祖禹，以情理而言，禹勤、禹祿兄弟生年應當晚於范祖禹數年、十數年，甚或數十年。范祖禹生於公元1041年，卒於公元1098年。若據《宦

24. 屈大均：《屈大均全集》，第3冊，頁82-83。

25. 屈大均：《屈大均全集》，第3冊，頁46。

26. 見《宦溪屈氏族譜》，抄本，頁7。

27. 見《新會縣屈氏族譜》，2005年修，稿本，頁13。

28. 屈大均：《屈大均全集》，第3冊，頁472。

溪屈氏族譜》所載其生卒年月，禹勤之弟禹祿居然長范祖禹二十四歲，顯然不合情理。

〈宦溪房始遷五代之宗圖〉：「禹祿，字誠爵，配梁，子二。公生於宋慶曆丁巳十一月廿二日申時，終於元佑己巳七月十八日午時，壽七十二歲。妣，生於宋慶曆丁巳七月初四日辰時，終於元佑甲子十月十四日申時。系南雄珠璣巷梁宏道公之女。與公合葬增城下靈圃。」²⁹ 這裏記載屈禹祿「生於宋慶曆丁巳十一月」，「終於元佑己巳七月」，而禹祿之子屈鱗、屈雄之生卒年皆無記載。慶曆為1041-1048年間宋仁宗使用的年號，期間無丁巳年。難道此丁巳是宋真宗天禧元年，即公元1017年嗎？這樣顯然與其兄禹勤受學於范祖禹的記載不合。因此，將丁巳確定為宋真宗天禧元年丁巳（1017）應該是錯誤的。那麼，族譜所載禹祿「生於宋慶曆丁巳」會不會是北宋神宗熙寧十年之丁巳（1077）呢？如果他出生於熙寧十年之丁巳（1077），再加陽壽七十二，其終年則為南宋高宗紹興十九年己巳（1149）。這不但可與其由南雄遷往廣州，卜居珠江之北鹿步司之事相合，而且也不悖其兄禹勤受學於范祖禹的記載。若按族譜所載「終於元佑己巳」，禹祿就不能趕上宋室南渡這一事變。「元佑己巳」為北宋哲宗元祐四年即公元1089年，距欽宗趙桓靖康二年（1127）北宋滅亡還有三、四十年。

不過，如果將禹祿生年確定為北宋神宗熙寧十年之丁巳（1077），也會面臨其他矛盾，因為這將與《宦溪屈氏族譜》所載其配梁氏及其父母的生卒年相距太遠。《宦溪屈氏族譜》載梁氏「生於宋慶曆丁巳七月」，「終於元佑甲子十月」。元佑為1086-1094年間北宋哲宗使用的年號，期間無甲子年，最合理的甲子年當為南宋高宗紹興十四年甲子（1144），梁氏與禹祿同年出生，如此則陽壽六十多歲，亦較合理。如果此處所謂甲子為高宗紹興二十四年甲戌（1154）之誤，則陽壽七十多歲，亦屬正常。〈屈氏由秘較公入粵宗圖〉記載：「曉，字秘較，配雷氏，子二。先世自楚三閩遷關中，宋南渡分支入粵。居南雄，後卜居番禺鹿步司飯籬岡鄉住。公生於宋太平興國戊寅年五月……終於宋嘉佑己亥四月初六日辰時，壽八十二歲。」雷氏「生於太平興國己卯年九月……終於宋至和甲午年十月……壽七十六歲。系南雄珠璣巷雷君建公女。與公合葬鹿步司石碑村附近雞籠岡。」³⁰ 既然將禹祿生年確定為北宋神宗熙寧十年之丁巳（1077），那麼族譜對其父母生卒年的記載也就需要重新審視。族譜所載屈曉生於太平興國戊寅，即公元978年，與禹祿生年之神宗熙寧十年之丁巳（1077）相距九十九年，顯然不合情理。相對合理的戊寅年，是北宋仁宗寶元元年（1038），父子年齡則相距三十九歲。屈曉年八十二而終，終年己亥，則當為北宋徽宗宣和元年己亥（1119）。雷氏生年之己卯，當為北宋仁宗寶元二年（1039），終年甲午，當為北宋徽宗政和四年（1114）。如此，則禹勤、禹祿兄弟皆可趕上宋室南渡這一重大事變，否則，隨宋室南渡的這一屈氏族人的共同記憶將完全落空。屈曉和雷氏雖卒於靖康國變前十年左右，但對結論影響不大。如果二人卒於由南雄南遷之前，禹勤、禹祿將其遷葬或終葬於廣州石碑村也可理解。嶺南客家等

29. 見《宦溪屈氏族譜》，抄本，頁8。

30. 見《宦溪屈氏族譜》，抄本，頁7。

族群有二次葬的習俗，且南雄距廣州不遠，遷葬於廣州亦在情理之中。具體年月容易失記，而對與重大歷史事變相關聯事件的記憶則不容易發生錯誤。

這一推測被後來發現的《番禺沙亭村孟舒祖家譜》抄本中的一段文字所證實。家譜所載為番禺沙亭屈氏支派屈孟舒一房族人。此抄本雖然蟲蝕破損嚴重，但有關禹勤的生卒年的文字卻基本完好：「誠齋，原嶺南道南雄府始興縣□□（筆者按：缺損二字）里珠璣巷……公生於宋元豐戊午二月十八日。受學范祖禹……徽宗崇寧四年乙酉鄉薦，大觀三年己丑進士。初任迪□（筆者按：缺損一字）……在世修行五十七年，終於紹興四年甲寅年六月十四日。娶南雄溪塘吳氏。」³¹ 宋元豐戊午，即北宋神宗元豐元年公元1078年；紹興四年甲寅，即南宋高宗紹興四年公元1134年。此處所載禹勤的生卒年雖然與宋室南渡的時間相合，但又衍生出一個新的問題。如前所論，禹勤弟禹祿生年當為神宗熙寧十年之丁巳（1077），而此處所載禹勤生年卻為神宗元豐元年，即公元1078年。兩者相較，弟卻長兄一歲，顯然，這裏出現了一個小小的矛盾。不但如此，《新會縣屈氏族譜》稿本與此相關的一個記載與此也有衝突。《新會縣屈氏族譜·屈氏世次圖》在始祖禹勤旁注曰：「叔祖禹儉，子孫在番禺縣飯蘿崗村。」³²《宦溪屈氏族譜》明確記載屈曉生二子，並明確記載了禹勤、禹祿二人的情況，卻沒有出現禹儉這一個名字。《宦溪屈氏族譜》雖然沒有明確記載孰長孰次，不過，從族譜右禹勤，而左禹祿的敘述順序，可知禹勤為長。筆者認為《新會縣屈氏族譜》中的禹儉與《宦溪屈氏族譜》中的禹祿當為一人。儘管孰長孰次，禹祿禹儉，尚存齟齬之處，但這些皆不關要旨，並不影響禹勤、禹祿南遷是在宋室南渡這一時代背景之下。

如前所述，在屈氏南遷的歷史上，唐代的屈政也是一個重要人物，雖然多處文獻提及，卻都語焉未詳。多個族譜亦未記載屈政的生卒年月。筆者在廣東的多種方志中也沒有查到與他有關係的記載，故屈政宦遊嶺南的具體時間則無由得知。唐亡於哀帝天佑四年（907），也即是說屈政宦遊嶺南的時間不應該晚於哀帝天佑四年（907）。如果按照筆者的推測，屈曉生於北宋仁宗寶元元年（1038），則二者相距一百三十多年，即使以族譜所載屈曉出生的宋太祖太平興國三年戊寅（978）為準，其間相距也七十多年。七十多年或一百三十多年的時間差，屈政與屈曉之間相隔當不止一兩代人，也就是說屈曉絕不是屈政之子。假如屈曉、屈禹勤等真的是屈政的後裔，也應當是其後數代之孫。

如果屈曉與屈政相隔數代，那麼除屈曉以及禹勤、禹祿等之外，宋室南渡前後，嶺南還有沒有屈政留下的其他屈氏族人呢？

〔康熙〕《廣東通志》卷十五〈選舉下〉載，進士，保昌，宋，「屈竦，端平，乙未」。³³ 阮元修〔道光〕《廣東通志》也有同樣的記載：進士，宋代，「端平二年乙

31. 見《番禺沙亭村孟舒祖家譜》，抄本，頁4。

32. 見《新會縣屈氏族譜》，2005年修，稿本，頁37。

33. 金光祖修，莫慶元等纂：〔康熙〕《廣東通志》，康熙十四年（1675）纂修，三十六年（1697）刻本，卷15，《廣州大典》，第246冊，頁435。

未……屈竦，保昌人」。³⁴《粵東文海》亦有記載：「屈竦，保昌人，端平乙未進士。」³⁵ 端平乙未，為南宋理宗端平二年，即公元1235年。保昌，在今南雄。明代郭棐的記載稍有不同。其《粵大記》卷四〈科第〉之〈宋進士科〉云：「端平二年狀元吳叔吉榜……屈竦，始興縣人……按：《通志》舊本無屈竦，又作乘朝宗，俱誤。今從新本。而王傑則據舊《志》增入云。」³⁶ 今之始興與南雄相鄰，皆屬今韶關市下轄之縣市。古之始興，某些時代所轄範圍很大，與今韶關市相當。因此，地名保昌和始興的不同對事實並沒有影響。阮元修〔道光〕《廣東通志》卷六十三〈選舉一〉又載：宋，「又保昌貢士……屈雷奮……以上十四人皆保昌人。見《保昌志》」。³⁷ 雖然不能確定屈竦和屈雷奮是否為屈政後人，但可以相信自唐代屈政至宋室南渡一百多年的時間裏，屈政在南雄一帶的後人應該不止屈曉、禹勤和禹祿這一支脈。

通過以上的分析，大體理清了沙亭屈氏南遷之始末，釋解了屈大均文字敘述的齟齬之處，同時，也發現嶺南屈氏南遷情況的曲折和複雜。屈大均簡單且矛盾的敘述應當源自所見文獻之不足，更源於經過時間的淘洗，過程和細節的丟失。屈大均自稱為屈原後裔，因屈原子孫無考，確實不能肯定屈大均與屈原之間是否存在直接的血緣聯繫。然而，正因無考，我們也不能輕率排除他們之間有直接血緣關係的可能。由於歷史的原因，唐和五代之後中國家族文獻大量散佚、湮滅，其後，多數家族纂修譜牒，其世次皆難以向上準確追溯。儘管如此，我們卻不能否定宋元之後一些家族在血緣上與上古、中古的關聯。沙亭屈氏南遷與中國的歷史大事變相關聯，是中國屈氏族人遷徙史上的大事。對其遷徙過程和細節的瞭解不但有助於探究嶺南屈氏族人來自何處，也有助於中國家族文化和中國移民史的研究。 □

（本文為2019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課題「南明文學作品全編整理與研究」（19ZDA257）的階段性成果。）

34. 阮元修，陳昌齊等纂：〔道光〕《廣東通志》，道光二年（1822）刻本，卷67，《廣州大典》，第252冊，頁306-307。

35. 溫汝能編：《粵東文海》，卷首，《廣州大典》，第498冊，頁10。

36. 郭棐撰，黃國聲、鄧貴忠點校：《粵大記》（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4年），卷4，頁89-90。

37. 阮元修，陳昌齊等纂：〔道光〕《廣東通志》，道光二年（1822）刻本，卷63，《廣州大典》，第252冊，頁256。